

教育的本土化與國際觀

林玉体

考試院考試委員

壹

許多台灣意識十分堅定與執著者，強烈的不滿台灣教育之欠缺台灣，並且此種欠缺由來已久，不是忽略台灣的語文、歷史、地理、音樂、美術、體育等等而已，還一再地在有意無意中，踐踏台灣的一切。公元二千年以來，稍能吐一口氣的是，居然台灣人可以當家作主了，但台灣主體意識在學校教育裡仍然延續過去大中國措施，一些知名度已臻世界級的學者，還一再的警告台灣本土意識者，不可心胸狹窄，眼光短淺；「本土化」(localization)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二者輕重的取捨，不只在政治上及經濟上是大費周章；也在教育及文化上令人大傷腦筋。二者合一而成為一個新的英文字彙，即 glocalization，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倒是困難重重。此種疑點，有必要進一步澄清，其實二者並非互斥，卻可相容。

第一，就時間點而言，台灣在近一百年來的教育，的確太疏忽本土教材，這是任何人都要承認的錯誤教育政策。當然有些什麼教授或政治人物，竟然還公開的說，台灣沒什麼文學、文化或歷史，這種人之無知與厚顏，相信目前已減少許多。事實上，教育「由近及遠」的原則，是天經地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台灣的一切，必須讓台灣居民及下一代一清二楚的了解。至於台灣的一切之好壞評價，那是見仁見智；這種主觀的斷定，放在中國或全球，也是如此。遺憾的是，可以作為教育奠基的台灣本土，過去已被蔑視那麼久了，為了補偏救弊，現在加強台灣本土意識，又有什麼不可以呢？總不可以再祭出「去中國化」及「寰宇觀」來作為力擋台灣教育本土化的藉口。

第二，國民教育階段，本土教育是第一優先，「未走先飛」，必定落空；無根的浮萍，搖擺不定。如課程不先由台灣開始，卻馬上跳到中國或世界，這是孟子的教訓「揠苗助長」，也是躐等。因此在教材的比例分配上，台灣、中國、亞洲、及世界，必前重後輕，否則就本末倒置。加上年級低的學童，本土的一切比較具體、鄰近、親切，因此學習起來效果較佳，興趣與動機一引出來之後，日後的求學，在知識的廣度與深度上已紮好根底；「好的開始，就已成功了一半」，這不是大家

都能接受的事實嗎？尤其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國家認同，現在的學校教室裡，還公然的張掛「我國地圖」，疆域竟然還包括中國大陸及蒙古，處處可見「我國唐朝」這種字眼。台灣的教育到底是為那一國來栽培「國民」啊！此事絕不能等閒視之，大方向未定，細節都是芝麻小事，只在技巧或方法上著力，教育部部長及政務次長如果對此事稍有猶豫，就應立即逼之下台，不容稍許發生差池！

第三，本土化不盡然只能「自珍」，其實也可上達國際觀的層級。以台灣歷史而論，難道學生可以不悉荷蘭、西班牙、大清、日本及歐美歷史嗎？台灣有國際級的醫生、大文豪、音樂作曲家、美術家、詩人、科學家等，因此台灣本土的一切，應取國際學術界的水準來分析、批判、闡釋，一方面不能孤芳自賞，一方面也不需自我作賤。吸取最進步的理論，學習世界上的強勢語文，納入環球的洪流裡，去蕪存菁，這才是最為健全的民主教育途徑！在本地化的地盤上，建立國際觀，最為兩全其美。

「本土化」是基礎，是教育上的「起點」(starting point)；「國際觀」則是教育的完成階段。在教育哲學論點上，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早在一百年前即指出，教育旨趣太過遙遠，則師生在教學上容易導致「驅策力的消失，動機力未被使用」；反而滋生「躊躇不決及拖延惡習」；從而「好高騖遠」成為思維習慣。支那文化是此種思維習慣的最佳楷模，生活在夢裡，不顧眼前實情，一廂情願，以虛幻來滿足一切。在窮鄉僻壤的小店裡，門窗必貼上「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店東把附近的小溪或湖泊當成三江或四海，一年營業額或許只可餬口，卻朝思暮想可以變成億萬富翁。台灣文化中支那文化此種毒素者，也不知凡幾。台北縣永和市的永平國民小學，校門口圍牆用昂貴但巨大的大理石予以建築，赫然書寫著：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拜託！只是6歲到12歲的小朋友，就得有這麼遠大的抱負，美其名曰「國際觀」，要有寰宇的胸襟，不怕千鈞重擔壓得透不過氣來嗎？孩子多無辜，也多不幸！如果終其一生，都得呼吸此種「國際觀」的氣氛，則必然視讀書為苦事，入校變成折磨；以大人無法達成的目標來型塑下一代，這正是「反教育」的佐證！

就台灣教育的「本土化」來論，以台灣為取材的標準及範圍，這是不容置疑的；就台灣教育的「國際觀」而言，絕不能認定與中國接軌就是教育國際觀的大

□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林玉体譯, 《民主與教育》。台北：師大書苑, 2000, 57-58。

部分。教材是要經過嚴格汰選的，「文化財」不必然等於「教育財」，「文化財」或許只是「實然」(to be)，「教育財」卻是「應然」(to be right)；以價值為衡量教育活動的指標，則台灣教育的「台灣財」、「支那財」、及「世界財」，都得經過洗滌與淘汰，通過「價值」考驗者，才可以編製在各級學校的教科書及參考讀物中，因為在學時間有限，且光陰極為寶貴。

台灣過去的教育，由於偏重支那的部分出奇得多，又經過美化及神化支那的手續，台灣師生的支那情支配著台灣人民的支那認同，又由於矮化甚至醜化台灣，遂使台灣的鄉土觀極為冷漠。近年來台灣本土政黨上台執政，此種偏頗現象正待快速導正之時，卻跳出第三種聲音來予以干擾，這就是「國際觀」。其實，台灣的「教育財」可作「二分」(dichotomy)，即「台灣財」及「世界財」；台灣財在國小佔的比例最多，中學及大學則成比例的縮小；相反的，「世界財」則在大學佔最大份量，中學及小學則往下遞減。「支那財」作為「世界財」的一部分，不過，由於支那與台灣的關係較為密切，當然在把支那置於台灣之外的「外國」時，享有優先及特殊比例。同理，日本與台灣的歷史因素不可切割，日本財也扮演突出角色；相對的，荷蘭財及西班牙財也能在世界財中分一杯羹。這才是合乎公平正義的教材編製！

貳

近幾年來，教育界盛行「學校本位課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這是來之於美國教育改革的教科書編製運動。其實，將 school-based 漢譯為「學校本位」，這是中文及英文造詣不佳的表示。在新加坡、香港、及中國的學校教育圈內，通譯為「校基課程」或「校本課程」，此種漢譯法，比「學校本位」妥當得多。因為「本位」涵有傳統的負面意義，涉及「自私」、「狹窄」、及「孤離」語意。英文的 based 並無「本位」意，是「立足」或「立基」。課程是學校教育活動最具體的內容，學童學習的教材，「先」以入學所處的社區為資源，每一學校皆有它的人文及自然背景，就好比建築矗立高聳的大廈，總得先找安穩的地基一般；打好地基，是任何建築物動工的第一步。school-based 的教材，就是各校及各社區的歷史與地理，加上族群的特色，school-based 也可叫做 community-based。換句話說，這也是教育活動中的「本土化」。台灣的學校都「立足於台灣」，那有「立足於中國」的？「立足於台灣的課程」(Taiwan-based curriculum)，正最能呼應 school-based curriculum 這種世界趨勢！

十七世紀時，英國最重要的公學(Public school)之一的倫敦聖保羅(St.Paul's)校長穆爾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1531-1611)，道出教育的正常化，是先有「本

土化」，然後才寄望「國際觀」。它的三句名言，變成教育改革的最佳榜樣：

I love Rome, but London better;
I favor Italy, but England more;
I honor the Latin, but I worship the English.

相信上述三句英文，台灣學生英文程度即令平平者，也能不必漢譯即能通曉。

「兼愛」是支那古代墨家的主張，儒學者則認定，「愛」雖是理想，但卻有「差等」；「自我」的愛，總在質及量上，優先於「他人」的愛，這是經驗上的通有現象。英國的學童喜愛遙遠的羅馬，但會更喜愛近在眼前的倫敦；當然，英國人尤其是倫敦人要好自為之，努力建設家園，使倫敦城市的美，及英國文化品質，不只不下於羅馬及義大利，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作為倫敦人及英國人，必以喜愛倫敦之情，高於羅馬，甲意於英格蘭者，更勝過義大利，喜歡說英文或作為英國人者，強過於書寫拉丁文或作為拉丁民族的一支。這種成果，必然要累積好幾代或數百年的功夫。不過有一件事實不容否認的是，喜愛倫敦，鍾情於英格蘭，或樂意當英國人，歡喜甘願說英語者，在主觀及客觀上都凌駕於羅馬、拉丁、義大利文之上，此種現象，必然是先建立起本土化的堅強信心，「好歹」也是自己的故鄉，那裡能夠不屑或蔑視自己的母語及居家環境的一切？「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自作孽，罪過大於天作孽，是不可活的！可悲的是台灣人在可信的四百年歷史中，從來不曾當家作主過。尤其在 1895 年難得一見的出現「台灣民主國」之際，國號竟然是「永清」。日本殖民台灣時，責罵台生是「清國奴」，中國國民黨據台時的教育及文化，也指斥台民是「亡國奴」。主政者既然認定學員是奴隸，久而久之，受教者就養成一種卑躬屈膝心態，腰桿直不起來。全民千載難逢有機會自己選總統時，台籍政客自動向大中國主義霸權者繳械，降格當「老二」。什麼時候，台灣的教育界及政治人物可以仿三百多年前英國教育家那三句佳言而大聲的宣示：

我愛北京，但更愛台北；
我喜歡支那，但更喜歡台灣；
我以當支那人為榮，但我崇敬作一個台灣人；
我樂意說北京腔，但我也景仰說台語。

「支那」若與「台灣」是平等又和善的關係，則在台灣而有祖籍支那者，願意當支那人，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數十年來，原先從支那各省來台者，幾乎已變

成少數；生活於現在的台灣「人」，既成長於台灣，竟然對台灣不生感情，卻還在意識上認同「江蘇」或「湖南」等支那各省分。試問這能「自圓其說」嗎？台灣欠了這批人什麼？真是「忘恩負義」的認知。但說穿了，這原來都是學校教育惹的禍！也是政治政策種下的錯誤！

英國文教界經過三世紀的辛勤耕耘，英語及英文現已變成全球最強勢的語文。十九世紀時，英國最古老的大學牛津，校規規定師生如說英語，要罰一英鎊，這所十二世紀即建立的中世紀古老的大學，是以拉丁作為國際性的學術用語的。此種學校教育上的荒謬現象，恰好是台灣學生的命運寫照。台生在日治及中國黨統治之下，說台語也得接受罰掃便所，掛狗牌等侮辱或處以一元新台幣的罰金！除此之外，英國的學術成就及民主政治之先驅貢獻，更遠遠的把義大利或羅馬拋在後頭；而倫敦城市令人嚮往，也不下於羅馬或威尼斯！

此種教育史上的類比，較無法相似的是羅馬帝國早已名存實亡，且距英國相離數千英哩。其後大英帝國的勢力及版圖，更超越羅馬帝國之上。並且英國文教界進行「本土化」時，拉丁化這種國際觀並不構成極大的威脅。台灣與支那就很難相提並論了，後者除了政治及軍事上對台灣造成最大的震撼外，更以經濟力及文化「優勢」，主宰台灣。不過，支那那種帝國式的專制體制，或許很有可能走上古代羅馬帝國及近代大英帝國的沒落之路，比較可怕及隱憂的是文化上的落差。幸而這也只是表象，不是實體！

參

台灣教育的取材，實質上卻是以支那文化為形式架構及實際內容。由於教育活動之無法民主化，導致於數十年之教育成效，台灣住民大多數嚮往支那文化的「博大精深」及「悠久高雅」，至於台灣文化如何，則在教科書及教育科目的比例分配上，只佔微不足道的地位。台灣未來可長可久的發展，理當以「文化立國」為主軸，而文化立國的最紮根工作，捨教育即無他途。

學術界實在應該加緊嚴肅又認真的探討台灣文化及支那文化，從事教育工作者，在師資培養機構裡，「教育史」是基本也是重要科目之一。「教育史」包括「西洋教育史」、「中國教育史」、及「台灣教育史」；但各大學院校之「教育學程」開有「台灣教育史」者，極為少見；而存在多年的「中國教育史」的書籍、講義、或記載資料，一如教科書中對支那文化的美化與神化一般，批判及分析力甚為薄弱，阿諛歌頌者有之，尤其對中國國民黨的「豐功偉業」，極盡著墨之能事。即令把台灣史納入支那史的一部分來說，在支那的教育史上，台灣過去的教育史實，甚至隻字不提；「教育哲學」一科，更誇張「三民主義」、「國父遺教」、「孫文、蔣

介石、及蔣經國」的「哲學思想」，奉之為舉世無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上乘教育思想家。但支那教育史及教育理念如放在「國際觀」的天秤上衡量，則相形見拙者層出不窮。傳統支那教育之重大缺陷及經久錯誤，實令人痛心疾首。要不是十九世紀末受到歐美文化及教育的衝擊與挑戰，否則極有可能還會殘害現在數以億計的中國學生。

文化範圍甚為廣泛，底細及事實之公諸於世，且繩之以哲理上的價值判斷，非本短文所能涉及。僅就高等教育一環，提供己見如下：

大學院校是一切學校教育的最高位階，也是教育成果良窳的收穫層級。歷史考據學家如胡適或許倬雲等人，公然認定紀元前漢代的「太學」或「國學」，就是中國最古老的大學。似乎讓讀者加深一種印象，中國歷史之古老，在大學教育上可溯源的年代，絕不下於歐洲中世紀（十一及十二世紀）時的「母大學」（mother universities），即巴黎（Paris）、牛津（Oxford）、沙列諾（Salerno）、波隆尼亞（Bologna）。當然，當過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讚美這所學界公認在時間上搶頭香的大學，但在世界大學史上算是小老弟，因為始自 1895 年由京師大學堂改制的北京大學，迄今也只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又怎能算「悠久」呢？比起日本 1877 年設的東京大學，還晚了數年，並且北京大學如要爭氣，最好不要與支那歷朝的國學或太學拉上關係，否則絕對不夠格稱為「大學」。

現在台灣的學術界及教育界，有不少人認定中國大學的水平，很令他們驕傲，政客一再聲嘶力竭的施加壓力，要求台灣執政當局承認中國學歷，這些人的心態，仍然是中了支那文教的毒，誤以為支那的大學可以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最少也超越台灣之上。但事實上，支那人自以為傲的「名大學」，在環球大學排行榜上連二百名都排不上，且名次更遠落後於台灣。這種排行榜公佈，來之於支那自己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除了具有具體的評量指標之外，如校友或教員中享有國際學術領域的殊榮等之外，另一項最不可或缺的條件，是「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有無。一所高等學府，如在「發表」（publications）上受到扼殺，講課如寒蟬，則教師自由（Lehrfreiheit）就有嚴重瑕疵；學生發問噤聲，則學習自由（Lernfreiheit）受到傷害；試問這又有何資格能列為「大學」之林呢！只有大學之名，而無大學之實，還有臉面與一流國家之大學平起平坐？

支那兩千多年的信史中，由於一言堂的儒學傳統，及專制政權的本質，即令有高等學府之空名，卻與「大學」無緣。比較像樣的大學，大概只能算是五四運動時代尤其由蔡元培主掌的北京大學，但那段時光甚短，大概不出二十年，學術自由之光如彗星一般的閃亮在支那的漫漫長夜中，卻瞬間即逝。因為支那自有「新式」也就是「西式」大學以來，整個學術界即籠罩在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的

「黨化」教育之下，「大學之道」竟然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總理遺教、「蔣公」訓詞為準則，這種羞於見天日的說法，竟然橫掃於台灣及支那的「兩國」教育及學術界中。

英國《泰晤士報》(Thames)也在2004年作過全球200所頂尖大學排名，是由全球88國的1300名學者來評分，其中一項指標是「國際聲望」佔50%，這是極為主觀的，該項評比中，支那的北京大學排名就比上海交通大學所作的排名，超前許多，前者居17名，後者則居202到301名之間。上海交通大學寧願放棄外國對支那較有面子的評比，而甘願以比較客觀的指標來評比，可見該大學之追求學術客觀性上，值得嘉許。支那的北京大學號稱最古老又最優秀的支那大學，可惜學術研究長期受蹂躪。曾到該校任教的台大陳鼓應教授之忍受不住該種氣氛，一心一意要返回台灣，可作為明證。而連戰等台灣政客到該校演講時，看看聽者(北大學生)之發問問題，以及對演講者內容未生疑點還頻頻報以掌聲，就可見該大學的素質。

台灣的高等學府，從日治時代晚期即有，當時由於「皇民化」教育雷厲風行，也與「學術自由」沾不上邊，因此也無資格享有「大學」美名。1945年之後，中國黨的思想控制及學術迫害，是台灣教育最悲慘的一頁辛酸史。自從二十世紀末台灣的邁向開放、多元、及民主之後、台灣的大學院校才能呼吸學術自由的空氣，因之連支那的大學自己所作的大學排行榜，台灣的數所大學都比支那的大學優秀。為什麼台灣的師生「長支那志氣，滅台灣威風」呢？

肆

台灣與支那，由於國際局勢發展的複雜，雙方如能「維持現狀」，則熱愛台灣之士能夠打長期戰的，就是從事文化的研究，除了還原支那及台灣文化的本來面目，讓兩國師生看出台灣及支那傳統文化的事實真相之外，還應提升台灣文化的水平。不少人認為台灣是「弱國」，所以拼不過支那，事實上，台灣在許多成就上，非但不是弱國，且更可與強國相抗衡；相反的，支那縱使在一些表現上是強國，但那種強是霸道與野蠻的表現，既不能服人，更欠缺美感；至少在文化及教育上，支那可供台灣學習者是少之又少。

靠海為生的台灣，文化本質早就與陸地文化的支那，大異其趣；過去由於教育文化政策的大中國情懷，台灣的師生心向支那大陸，也依附於所謂的「祖國」(其實這也是台灣文教上的錯誤標記)，今後教育政策何妨改弦易轍，一百八十度的調整方向，面對東南亞、南洋、及地球上面積最大的太平洋。隨著科技的進步(這一點也是近幾年最遙遙領先支那的部分)，台灣這個「小國」，如能仰海而生，將

是舉世難以匹敵的海上大國。當年英國與歐陸交惡，除了常與西班牙、法國、及德國作戰之外，英吉利海峽兩岸也各自發展出殊異的語文、度量衡、幣制、政治架構、學術文化及教育系統，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自成一格」，此種先例，可供台灣學習及模仿之處頗多。當然，除非支那主動掀起台灣的戰爭行為，否則台灣不必如台語老歌「草螟弄雞公（現在是雞母）」一般的向中國挑釁。善於了解國際強勢（優雅）文化的特質，去蕪存菁，不該保留的文化遺產，送進博物館當憑弔之用，如慘受支那文化荼毒的類似纏足之惡習，剷除仇恨，族鬥，械鬥等敗壞的風俗，改掉諸如「天烏烏」的歌詞，易「兩個相打弄破鼎」，為「阿公阿媽共煮同吃泥鰍魚，笑呵呵！」，聽來是夫婦相親的曲調！

台灣文化歷史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是發展卓越文化的重要條件，這是上天賜予寶島的特殊資產，台灣人好自珍惜。自古以來，台灣居民在醫學、文學、美術、繪畫、詩詞、音樂、雕刻、自然科學上早就有世界級的學者，留學生在國際一流大學獲取博士學位者數以萬計。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榮登諾貝爾獎桂冠者有之，獲頒奧斯卡金像獎者也喜訊傳來，如能以台灣本土化來深耕，向外眺望國際視野，則或許有類似英國牛頓級的科學家或莎士比亞的曠世戲劇家。少數菁英的非凡成就，台灣人絕不輸給支那人及歐美人士，而芸芸眾生懷著樸素的善良心靈，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與人友善的相處，攜手合作的社會團契感；更加上台灣居民在血統上滲有歷史因素的荷蘭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支那人、日本人、歐美各國傳教士的 DNA，及近幾年來亞非、南美、東南亞人之與台民通婚，混血兒（如林憶樺小朋友事件）不計其數，「台灣人」已成為世界人的一種。「國際觀」是不愁的，「本土化」更是理所當然，教育活動再加一把勁，則二者形同走路時的雙腳並行一般，是極其自然的景觀！

伍

當「台灣」與「支那」二者相互尊重、合作、且禮遇時，身在台灣的住民，兼有「台灣人」及「中國人」身份者，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雙方劍拔弩張時，就得選邊站了，二選一，沒有其他選擇。在過去數年中，民意調查所顯示出來的自認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者，有大幅度的成長，且有增無減，相反的，自認是中國人而非台灣人者，比例則相對的遞減。這當中，也有不少百分比是自認屬於中國人也屬於台灣人者，此種認知上的錯亂，在台灣教育上「本土化」加強實施之後，相信必會如同幾何級數的消失。台灣本土化是台灣國家認同的初步，教育及文化界應承擔此重責大任。school-based的school，不是指的是Taiwan又是什麼呢？當然，台灣的政治轄區，目前是包括金門及馬祖的，外島的學校教育，教科書自然

以外島作為「based」，又怎能以不屬於學校所在地的中國作based呢？公務人員考試，既為「本國」轄區服務，又怎能不把「本國」界定為台灣中央政府所管轄的地區呢？「本國史地」之界域甚明，又怎會與中國糾纏不清呢？此種事件之具有爆發性，十足的顯示出過去教育及學術研究方向的荒謬，連專業的院士，都變成常識的侏儒，著實可憐！井底之蛙，如此「管見」，又那有國際視野？不只本土化一無所有，環球觀也蕩然無存！

世界教育史上最令人嚮往的是古代希臘的雅典文化及教育，雅典只不過是一個小城市，但卻放出萬丈光芒且永不熄滅的典雅文化。台灣學子是否也有類似的使命感；歐美許多一流文教地區，也都取雅典作為榜樣，號稱雅典第二。台灣文教界真正走向本土化及國際化之下，或許有朝一日，也會變成雅典第二；期待全球許多街名或別墅建築，取台灣當招牌！此種夢想，應該有實現的一天吧！「愛拼才會贏」，台灣的老歌不是這樣唱的吗？台灣人是會拼的，台灣錢淹腳目，已是各地人民都看到的面貌，但拼要拼對方向。國際觀是無爭議的，本土化最該也最先要加強！

□ 「國際」認知的China，音譯是「支那」，「支那」也是古名面目，漢譯為「中國」，是扭曲原意。以「支那」來取代「中國」，應是台灣文教改革中的一例。「中」含有「真善美」的「恰好」意，因此國名取「中」，人名也取「中」（如中山、中正）。任何把「尊嚴」無限上綱的國家，皆可自命為「中國」，居世界之「中」，其他各國皆形同眾星拱月般的環繞著「中國」。